

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DOI:10.15998/j.cnki.issn2097-6763.2026.04.002



以天下理论重构高等教育世界空间

吴天一¹, 祝 刚²

(1.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厦门 361005; 2.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场域呈现愈发复杂的空间秩序及多元互动关系。然而,当前主导的方法论民族主义范式将高等教育研究困囿于“国家”这一内生性分析单位之中,不仅忽视了国家内外多种全球与地方力量的作用,固化了以国家竞争为核心的际间思维,还削弱了高等教育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精神,阻碍了全球高等教育空间的有序构建。对此,亟须在更具开放性与整体性的空间认识框架下更新高等教育的世界意识,重塑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世界的认识。赵汀阳提出的天下理论为重新审视高等教育世界空间提供了一种系统而完备的空间秩序构想。天下视域下的高等教育世界空间呈现完备的空间秩序与共在的大同模式,以非排他性的世界共同利益与关系理性确立伦理立场,并依托具有普遍效力的秩序维护体系运作。天下理论将“世界”恢复为世界研究的主体,为突破当前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研究长期面临的尺度错位、价值碎片化与治理失灵提供了替代性解释框架。以天下理论作为重思高等教育世界空间的理论资源,象征着将中国哲学智慧转化为面向世界的理论语言,回应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贡献中国话语的时代需求。

关键词:天下理论;高等教育空间;方法论民族主义;和而不同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763(2026)04001311

一、问题提出

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于1972年提出社会空间概念,强调空间不仅是物理或地理的实体,更是社会关系与实践的产物,是人类有目的的社会活动载体^[1]。空间秩序由现实的生产关系所建构,并生产出相应的语言符号系统,通过控制空间的知识体系形成隐性的空间权

修回日期:20251125

作者简介:吴天一,女,浙江温州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比较教育研究;
祝刚,男,河南洛阳人,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

引用格式:吴天一,祝刚.以天下理论重构高等教育世界空间[J].重庆高教研究,2026,14(4):1323.

Citation format: Wu Tianyi, Zhu Gang.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 Space of higher education by using the Tianxia theory[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6, 14(4): 1323.

力,干预现实空间的建构^[2]。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进一步将传统静止、封闭的空间置于异质性、关联性和共时性的社会关系意义链条中^[3]。空间理论揭示了人类实践在根本上受由空间与时间共同构成的基本构序系统(ordering system)的影响^[4],空间转向因而成为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取向^[5]。

教育空间是制度、话语和人互动的重要场域^[6],空间作为高等教育实践的基本载体,以时空为基本坐标,同资本与阶级、政治文化与规制、语言与知识、种族与民族、性别与性取向等多重因素相交。高等教育发展的非均衡性,根源于空间中自然和社会属性的非均质性^[7]。高等教育中的空间研究以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最具代表性,他将社会空间生产划分为“空间实践”(La pratique spatiale)、“空间表象”(Les représentations de l'espace)与“表征性空间”(Les espaces de représentation)三重维度^[8]。空间实践指涉教育活动的物质性维度,空间表象代表行为主体对空间实践的抽象性认知,表征性空间维度既包括空间表象认知对空间实践的赋意,又保留了空间实践外的不可感知部分^[9]。空间三元辩证法揭示了高等教育空间及其多重维度对高等教育活动的深刻影响,三者间的互动不断重塑高等教育的空间生产与图景。

全球化的纵深推进将各国高等教育置于全球竞争舞台与互联网络中,世界高等教育呈现更为丰富的格局。然而,高等教育空间认识仍受限于传统国家框架所主导的研究范式,以简·奈特(Jane Knight)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为代表的研究范式未能突破际间思维限制,使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研究长期陷于国家利益逻辑,从根本上限制了高等教育世界研究的形成。尽管跨国教育与知识技术输出提升了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但也强化了中心国家的话语与制度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限制使得高等教育难以回应全球化时代打破际间竞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亟须更新高等教育的世界意识,以一种更加完整的空间观理解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的国际化与全球化理论虽然作出了有益的理论探索,但仍暴露出本体论上的结构局限性。根植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天下理论,给出了当下最为完备的空间认识论,是全球化时代解构与重构高等教育世界空间的重要理论资源。基于此,本研究围绕如何以天下理论重塑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世界空间认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首先,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解构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空间的结构性困境;其次,引入赵汀阳天下理论,阐明其相较于既有国际化与全球化研究范式的超越性;最后,从理论层面探讨天下视域下高等教育世界空间的可能图景与实现路径。

二、以空间思维审视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在通信技术革新、地缘政治变迁、新自由主义扩张、国际资本流动、贸易自由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迅速发展^[10-11],全球知识经济体系随之形成,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既是社会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基石,也是推动全球格局重塑的关键力量。高等教育普及率大幅提高,跨境教育合作、国际学生流动和全球科研网络不断扩展,高等教育全球化成为关乎国家战略地位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12]。然而,当前对于高等教育全球性活动的研究虽然冠以“全球”“世界”,但实质上仍未破除“国家”“际间”的核心所指。无论是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还是奈特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其表面呈现的超国家视角仍受方法论民族主义影响,未能充分反映全球维度的复杂性,展现出片面的、局限的空间认知。事实上,空间是在三重维度的辩证互动中实现生产与再生产的。当“国家容器”成为空间实践的主要载体时,高等教育的全球认知便不可避免地被限定于际间思维模式中,以国家性认知蒙蔽世界性想象,并通过实践互动与观念再生产进一步塑造高等教育的全球空间。

(一)国家本位的空间实践困境

当前的高等教育全球化实践仍以国际化为主要形式与载体,整体运作仍未突破国家尺度^[13]。自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知识经济范式转型以及冷战格局终结,促进了各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化合作,出现了诸如欧盟“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me)与“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等区域合作倡议,凸显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价值。在此基础上,高等教育全球活动在两种逻辑与模式之间摇摆:一是基于共同价值与制度互信的合作模式,以研究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高校联盟以及“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等区域性计划为代表的价值共同体范式;二是以人才、资源与声望竞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范式^[14]。这两种逻辑在高等教育全球活动中往往交织共存,使全球高等教育成为一个充满合作与竞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张力空间。

在这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交织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由经济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范式转型趋势。随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所揭示的全球治理挑战愈发突出,以跨境流动和经济利益为主导的传统国际化路径受到冲击,课程体系改革、全球胜任力培养与世界公民教育等“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元素逐渐成为国际化政策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国际化的治理主体也日益多元,除了国家政府外,政府间国际组织(欧盟、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政策协调与标准制定强化制度供给,专业机构(国际大学协会、欧洲大学协会)通过改革议程推动国际化的制度化发展。然而,无论是价值转型还是治理多元化,均未能从根本上突破国家本位的空间结构预设。区域共同体框架下的合作本质上是成员国国家利益的聚合体,其价值预设天然具有区域排他性,难以实现真正的世界普遍性。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虽然在形式上致力于解决世界性和全球性问题,但其组织架构与决策机制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这种“国家间”(inter-national)而非“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属性,决定了其无法突破国家本位的思维局限,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更需警惕的是,某些国际机构所标榜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已经成为特定国家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

(二) 际间思维下的空间表象局限

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普遍受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制约,这一国家本位的认识论将社会发展预设为民族国家内部自发的现象,其根本局限性在于强化社会变革的内部决定论,忽视跨国与跨境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塑造作用^[15]。方法论民族主义广泛渗透于各学科领域^[16],而被禁锢在“国家容器”的研究本身又在不断增强这一范式^[17]。即便研究者意识到全球维度的渗透性和地方维度的差异性,其分析仍隐含“国家自足性”前提,忽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空间的复杂性与多尺度性。

作为全球化在高等教育领域拓展的产物,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同样未能突破国家尺度的深层限制。自奈特于 1994 年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以来,该理论一直占据话语中心^[18]。她将全球化界定为对高等教育的外部威胁,而国际化则是对其的“良性回应”^[19]。这一善恶二元论无形中将国际化的分析尺度固定于国家层级,遮蔽了理论理解世界尺度的可能性^[20]。类似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虽然以“世界”为名,但仍以国家及其利益结构为基本单位,并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普遍参照,将非西方国家置于体系边缘,呈现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21-23]。

视角上的结构性限制使得高等教育全球研究往往将美、英、澳等国家的经验普遍化为所谓的“国际理论”,并通过理论传播或移植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中心国家进一步主导全球高等教育系统的界定标准、理解框架和比较基准^[24]。同时,这还引发全球化与国际化之间的概念混沌,遮掩了两个术语之间的本质差异:国际化关注的是国家及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互动,而全球化则呈现更加宏观的视野,强调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体系^[25]。在具体的研究情境中,学者们将这两个分别对应完全不同的空间构序格局的概念视为同义词,引发高等教育国际研究同全球研究与世界研究之间的界限不清,削弱了对世界问题的分析能力。

(三) 受公共利益窄化的表征性空间

表征性空间指向高等教育行为主体的具身性体验,由空间实践与空间表象共同生成。然而,当国家成为高等教育空间的主导框架时,主体的价值想象便局限于民族国家利益,进一步固化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虽然各国普遍以“公共利益”(public good)作为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起点,强调服务本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却忽视了高等教育在构建世界高等教育共同体中的责任,窄化了高等教育空间的价值维度。

虽然“高等教育为公共利益服务”主张长期在西方学界中占主导地位,但其理论与实践局限也日益凸显。其一,高等教育并未向全部公众开放,学位教育仍具有精英化属性。其二,边际主义经济学将高等教育产品区分为“基础研究—公共物品”“教学认证—私人物品”的二元属性,削弱了洪堡“教学与研究统一”的理念。其三,在全球治理层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全球公共利益框架虽旨在构建具有普遍价值的全球合作体系,却因管辖权界定模糊、企业参与边缘化以及合作激励机制缺失等原因,难以真正形成具有普遍效力的价值体系^[26]。

相比之下,“全球共同利益”更能为高等教育世界空间建构提供价值支撑^[27-28]。共同利益(common good)强调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等主体间的协作实践,突破了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界定,更贴合当代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科研合作与全球问题解决的实际逻辑^[29]。知识本身即为重要的人类共同利益,作为由思想独立的大学中相互关联的学术自由实践所维系的全球空间,高等教育在创新、科研和文明对话中所担负的全球性功能,使其天然指向共同利益而非单一国家利益^[30]。尽管如此,共同利益在西方话语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根源在于西方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传统,即现代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将社会关系理解为外在契约,强化了个人利益优先于集体福祉的价值结构^[31]。这一深层文化逻辑使共同利益难以成为主导性价值范畴,也进一步固化了高等教育价值体系中国家中心的表征性空间。

(四) 全球化空间理论的困境与突破

总的来说,现有全球化理论虽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跨国实践,但仍难以支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空间”建构,其局限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在本体论上,全球化与国际化理论尚未真正确立以世界为整体的存在结构,其深层逻辑仍依托现代民族国家体系^{[32]16}。在价值论上,全球化理论缺乏超越国家利益的世界价值,其普遍主义伦理多以西方为中心。高等教育在知识生产、文明交流与社会责任方面的天然共同利益属性,与其实际运作中的国家中心逻辑之间形成显著的矛盾张力。在制度论上,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仍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遵循“国家间政治”的运作逻辑。高等教育治理也缺乏具有世界效力的制度化权威,更多表现为中心国家制度的外溢与扩散,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制度”。

必须承认的是,全球化研究的理论创新正在不断突破国家中心框架与际间思维^[33]。乌尔希里·贝克(Ulrich Beck)充分吸收古希腊哲学的世界主义和世界政治思想,批判欧洲中心的普世主义社会学,主张构建世界主义社会学与方法论世界主义,以纠正国家本位的社会科学范式^[34-35]。阿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全球文化景观为理解世界的“后民族”(post-nationalism)特征性、流动性和多中心性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36]。戴维·汉森(David Hansen)则将世界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主张以全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作为思考世界秩序的起点。这些尝试均为全球化研究超越国家尺度提供了重要启示。

然而,无论尺度局限还是突破尝试,当代国际化与全球化研究仍深受西方理论范式的主导。以西方为方法的思维惯性遮蔽了中国思想资源在世界问题上的独特贡献。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传统并率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明体,中国早已在古典“天下”思想中孕育出超越国家疆界的世界观,并在赵汀阳的系统重构下发展成为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政治哲学。将天下理论引入高等教

育世界空间研究,不仅赋予高等教育世界研究以新的理论可能,也为中国学者与中国理论在全球知识体系重塑中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创造了可能。

三、天下理论:一种更加完备的空间哲学

赵汀阳天下理论的提出始于对全球化时代“无效世界”的批判^{[32]104}。他认为当今世界之所以仍停留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指出的“混沌”状态,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世界制度^{[32]260}。虽然全球化已经将所有国家与地方问题统一置入世界情境,但人类思想仍滞留在混沌状态^[37]。在这一制度真空下,国际关系呈现强者制定规则、弱者被动应对的丛林状态,中心国家通过普适化自身文化巩固霸权,边缘国家则在抵抗与适应之间艰难生存。要摆脱无效世界、实现全球共同利益与人类整体发展,需要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人民身份认同,构建一个基于共同价值的世界社会。显然,这一世界秩序的建构必须以直指世界主体的哲学范式为理论基础,提供必要的逻辑正当性与方法论支撑。在此背景下,赵汀阳援引并重新诠释了中国传统天下概念,将其建构为一种实现世界有序治理的规范性模型。

(一)天下的三重内涵:质料、价值与存在形式

天下这一概念具有丰厚的哲学内涵,赵汀阳认为天下概念包括世界、民心、世界制度三重含义,分别代表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政治世界三重维度^{[32]110},并将这三重概念内涵分别定义为天下的质料、价值与存在形式,三者互为必要条件,共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世界。

1. 以“世界性的世界”为主体

作为一种关乎世界体系建构的哲学范式、世界观和世界哲学,天下理论所主张的世界是一个涵盖全球、国家、个人多重空间秩序的完备空间。天下的基本立场在于将世界视为一个最大且最高的单位,意味着其以高于并且大于民族国家或地区的视野去理解世界^{[38]120}。同时,其所倡导的世界是一个多维的世界,而不同于单一层面的全球抑或民族国家。世界性的问题只能在世界语境中以世界标准而不能在本地语境中以国家标准去分析和衡量^{[32]113}。天下理论正秉持一种适合解决世界问题的世界尺度,其焦点落在世界性而非国际性问题上,是一个最大化视野的理论。

2. “和而不同”的共同利益主张

蔡邕“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的论断确立了天下观与西方世界观的根本差异,后者由国家利益主导,天下体系则由世界共同利益维系^[39]。赵汀阳以民心这一表述指代天下的共同利益,并将其确立为世界制度合法性存在的根本依据。民心是经过理性分析而得出的那些有利于人类普遍利益和幸福的共享观念,是真正出于公心的为公而思的思想。同时,民心并非某一强国利益的普遍化,而是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和”。赵汀阳将“天下无外”作为天下的基本立场,由此推演出“和而不同”的共同利益的基本原则。

天下本质上是一个无边界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存在论框架,其核心特征在于消解了“外部性”范畴。在这一认识论下,世界不包含具有威胁性的他者,仅存在基于文化亲疏的差序格局。这种关系模式在理论上确保了世界的先验统一性,使天下体系成为符合文化生态要求的世界制度范式。与之相对,若将世界预设为分裂的实体,那么要实现世界统一性则必然诉诸武力征服或文化统一两种暴力路径。这两种方式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多样性,但多样性恰恰是维持世界文化生态活力的必要条件。天下理论提供了一种超越此二元对立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天下世界的先验一体性并非对世界内部多样性的否定,而是对后者的根本保障^{[32]77-80}。同时,世界内部多样性也构成万物存在的必要条件。赵汀阳将“和”作为天下世界和谐的先验原理,即唯有存在可供“和”的多元要素,方能实现万物之“生”。换言之,多样性的和谐维持着天下的本体完整性以及永续发展的生命力。

3. 有“治”的天下

天下所包含的三重价值意蕴,阐释了实现“天下为公”理想的基本条件——作为世界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体现“民心所向”的根本要求。正如赵汀阳所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人都为天下着想。”^[32]²⁷这一理想的实现与永续运作,需要匹配相应的世界制度,以维系“天下大治”的秩序状态。

世界制度的建立内嵌于天下的根本主张之中,源于其作为最大空间与政治单位的内在需求。一方面,民心向背构成天下体系良性运作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制度维护的核心。就民心的实质而言,利益与幸福虽为其基本指向,但在政治哲学层面,无法先验地规定二者的具体内容,只能探究其实现的普遍条件。西方哲学强调“自由”作为关键条件,若制度无法保障个体基本自由,则追求幸福的可能性就会被否定。然而,自由并非充分条件。中国哲学揭示了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必要条件:“治”(秩序)。缺乏秩序的社会既难以存续,也无法为多元生活提供可能,自由也将失去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世界制度的建立也源于“天下”作为最高、最完整政治实体的本质要求。从政治秩序的建构维度看,任何政治实体都必然嵌入更高层级的体系中,并依赖该宏观体系保障其外部安全。因此,除非某一政治实体本身即为最高政治存在,否则必须接受更高层次权威的治理才能够保障其秩序运作。

连贯一致性是“治”的基本要求^[32]⁶⁶⁻⁶⁷。世界的各部分与各层次皆需有序,且须遵循统一秩序,以维持系统运行的连贯与一致。在整体治理系统中,各个层次之间存在明确的逻辑从属关系,治理次序必须自上而下,方能有效确保每一层次的秩序。一个有效的制度必须能够普遍应用于所有层次与单位,并具备层次间的普遍性和传递性,如此才能消除冲突和不协调,构成一个具有建构性的“政治连续统”。

(二)从全球到天下:天下观的超越性

首先,天下理论的根本超越性在于从本体论层面确立了世界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合法性,从而突破了现有全球化理论普遍依赖的国家容器框架。现代全球化与国际化理论往往将世界视作国家间网络的延伸,其深层结构仍以国家体系为基底^[42-43]。在此意义下,“世界”只是国家互动的场域,而非独立的主体。对此,赵汀阳明确指出,世界问题是高于国家且不止步于国际的,必须由国际关系进一步上升至世界总体层次^[38]³¹⁶。通过对世界主体的重新确立,天下理论在本体论层面实现了对现有全球化理论的根本超越。其次,以世界为本体的空间观必然要求以符合全人类关切的共同利益作为价值纽带,这构成天下理论在价值论上的第二重超越。赵汀阳指出,天下理论的深度基底是人类存在论问题,其核心在于探讨复数主体的共在可能性以及主体间分歧的跨主体和解^[40]。以和而不同的共同价值为纽带的天下体系,能够从根本上消解国家中心世界观中的对抗性。最后,天下理论通过“世界—民心—世界制度”的逻辑结构,为突破现有国际制度的尺度限制并构建具有普遍效力的世界制度确立了逻辑正当性与理论合法性。由此,天下理论实现了本体论、价值论、制度论三重超越。

天下理论在 3 个维度提供了超越现代全球化理论的空间哲学框架,为构建世界整体性的空间认知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意义不仅在于补足既有全球化理论的结构性缺失,更回应了高等教育世界空间重塑的理论需求,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且具有普遍价值的高等教育世界空间提供了一条新的理论路径。

四、天下视域下的高等教育世界空间

基于以上分析,在全球化不断深化而世界整体性认知稍显不足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世界空间的重构急需一种能够同时解释世界整体性、本体价值及制度形态的空间哲学,而天下理论恰好为此提供了可能。天下理论的本体论、价值论与制度论基础,为高等教育世界空间从全球化走向世界性的范式转化提供了理论支点。

(一) 完备的空间与共在的大同模式

方法论民族主义阻断了对高等教育多尺度空间结构的理解,而天下理论提供了一种能够包容地方、国家、区域与世界多个层级的整体性空间视角。在此框架下,高等教育不再被分割为国家内部系统与国家间互动,而被视为由跨国科研网络、国家政策体系、地方高校组织与基层知识共同体共同构成的多层空间整体。由此,天下观为高等教育世界空间确立了完整的地理尺度,使不同主体的知识生产与学术实践获得平等的存在位置。

天下世界中的各平等主体以关系确立存在,以“和”消解旧世界体系中的冲突^{[38]118}。传统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国际秩序包含了潜在的冲突逻辑,而天下的先验一体性和“无外”原理为空间结构提供了非对抗性的存在基础,确立了主体间以共存(co-existence)作为存在(existence)的先决条件^[41]。高等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被理解为零和竞争,而是以相互承认、知识共享与合作生成来确立自身的存在与价值。差异在此不被视为冲突来源,而是构成和而不同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高等教育世界空间的建立将抹除以国家或单一个体为基本单位的旧秩序,呈现网状的存在格局,其中的任何主体无法孤立地确定其存在合法性,而是在知识的共享与合作关系中确立自身的存在。

总体而言,天下构想的高等教育世界空间呈现一个包容性更强、尺度更完整的空间结构,其核心在于以无偏性原则为所有类型的知识生产主体提供平等进入全球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削弱全球知识网络的等级化,使世界高等教育真正走向开放获取、共享合作与公平共治。

(二) 非排他性的世界共同利益

现有的高等教育全球实践仍深受国家利益与市场逻辑影响,其根源在于现有全球化逻辑是以个体理性与排他性利益最大化为中心的价值框架。相比之下,天下理论提出以民心作为世界秩序的价值纽带,为高等教育世界空间的建构提供了伦理基础。

天下理论以世界共同利益为价值起点,使世界高等教育得以从国家偏好中抽离出来,转向以知识增益全人类为终极目标的共同性价值。所谓共同利益并非伪装成普世价值的国家利益,而是满足所有主体基本福祉的价值选择,优于任何单一国家、群体或意识形态的偏好。共同利益的实现以“孔子改善”为基本原则,即所有人的利益应共轭增长。这一主张同高等教育以知识生产惠及全人类的终极理想高度契合,亦使天下价值具备普遍兼容性和共享性,成为全球共同的精神“聚点”^[41]。此外,天下理论以关系理性替代排他性个体理性。前者优先考虑如何将各方对彼此的伤害最小化,而非将排他利益最大化^[42];后者则从逻辑上否定了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往往使得空间的运作走向集体非理性,泯灭了共同发展的基本精神^[43]。以关系理论的价值主张对所有个体展开二次思想启蒙与思想重塑,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共同价值实现的可行性。高等教育世界空间在此框架下得以摆脱单向度的竞争逻辑,转向以减少损害、增进合作为原则的价值运作。

(三) 以具有普遍效力的秩序维护体系运作

随着全球化进程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深入,既有的国家本位治理模式暴露出难以调适的本质弊病:高等教育国际化虽然扩大了教育的跨境流动机会,却加剧了人才的单向流动、营利性留学教育的不平等效应以及高校间的纵向分层;欧美中心主义规范与制度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压缩了非西方知识体系的空间,再现了殖民时期的知识权力格局^[44]。对此,国际组织的多边协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部分冲突,但由于仍以国家利益为基本单位,其制度效力无法支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知识秩序^[45]。

在此情势下,重构具有世界性的高等教育空间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共同诉求。高等教育部门长期依托共同议程开展跨国合作,因而比其他领域更具建设全球权威的结构性优势。然而,现有的自下而上的合作网络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自上而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权威亦受限于地缘政治分

歧而难以发挥整合作用。因此,构建一种能够超越国家利益、维护全球合作的替代性世界性权威,成为全球高等教育迈向共同利益建构的关键前提。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权威不能依赖强制力,而需以道德感召力为基础,通过培育跨国界、跨文化的合作网络,为高等教育世界空间的重塑奠定规范基础^[46]。

天下理论提出的“以道义为核心的世界制度”为构建这种替代性全球权威提供了理论支点。天下理论强调道德感召的重要性,但否定以伦理道德作为政治问题最优解法的取向^{[38]135},主张以“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世界制度”来统摄全球、区域与地方等多层级空间的治理秩序,以实现规范的逻辑一致性与有效传递。这对高等教育世界空间的治理提出了颠覆性与可行性并存的方案。将此应用于高等教育世界空间治理,意味着在两个层面上实现范式转变:其一,高等教育的世界秩序需由以国家或霸权机构制定规则的模式转向基于共识、由全球学术共同体围绕知识生产与人类福祉的共同利益自下而上生成的价值秩序,从而瓦解以竞争性知识体系为核心的霸权结构;其二,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具备自上而下执行能力的世界制度,使共同利益与趋近公平性原则在高等教育世界的各层级与各区域得到一致贯彻,以确保高等教育世界空间的有效运作、可持续发展与真正意义上的共享治理。通过这两个层面机制的耦合,天下理论为全球高等教育提供了一条兼具规范性、可行性与结构稳定性的治理路径。

五、结 语

天下理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杨力蒗指出,作为区别于欧美中心世界观的认识论,天下理论在阐释全球高等教育现象方面具有独特解释力,具体体现在以下 4 个核心维度:世界主义与天下为公的规范理念,和而不同的差异共生原则,全球治理中的伦理向度,以及对世界作为生态共同体的建构性想象^[47]。杨锐则警示天下认识论内部既包含无边界的包容理想,又潜藏“中心—边缘”的秩序逻辑,可能滑向以西方或中国为中心的本体论预设^[48]。马金森等国际高等教育学者也肯定天下思想的理论价值,认为其有助于解构西方二元论主导下的认知范式,破除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民族主义桎梏,并指出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核心场域,因其固有的全球网络特性与共同价值基础,具备实践天下理论的结构优势^[49]。这些研究共同推动了天下观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理论深化与国际话语传播。

本研究将天下理论引入高等教育空间研究,其价值体现在世界性与中国性双重维度上。面对当代高等教育领域日益复杂的空间秩序与互动逻辑,天下理论将世界恢复为世界研究的主体,为突破当前高等教育全球化、国际化研究长期面临的尺度错位、价值碎片化与治理失灵提供了替代性解释框架^[50]。天下理论提供的并非世界主义的政治正确秩序构建,而是“为文明建立一种宇宙论式的生态系统秩序”的整体世界观^[37],旨在为人类文明建立一种可持续、包容与公正的世界结构。其意义在于回应了高等教育世界空间重塑的理论需求,补足了当前全球化理论的深层缺口。

天下理论不仅是一种世界理论,也是一个中国理论。建构天下视域下的高等教育空间的中国性意义在于,这一理论虽然源自中国,却提出了一种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同于西方中心价值论的世界观。这一理论的运用不仅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世界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51],还作为一个符号,象征着将中国哲学智慧转化为面向世界的理论语言,在话语的国际传播与理论交锋中确立其学术主体性。天下理论同高等教育世界空间的创造性结合,回应了我国当前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贡献中国话语的时代需求,是中国传统智慧当代转化的最好佐证。这不仅为中国在全球知识体系中提供了新的理论贡献,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自主、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识^[52]。

需要强调的是,天下理论虽然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但并不代表霸权的延伸,其旨趣在于提出

一种关乎世界秩序建构的普适性理论体系,以“世界性的世界”为核心关怀。当前国际学界对天下理论存在部分质疑,担心天下体系可能导向所谓“中国治下之和平秩序(Pax Sinica)”或一种新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53]。然而,正如赵汀阳所回应的那样,“中国是个故事,而天下是个理论”^[54]。天下并非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延伸,而是对世界秩序可能性的重新设问,旨在回答“世界如何成为世界”这一跨文明共同关切的哲学问题。中国在此所能做出的贡献,不在于提供一种主导性的秩序模式,而在于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为世界治理与哲学思考提供新的范式与实践可能。这不仅拓宽了中国哲学的世界视野,也以中国经验为范本为全球思想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6875.
- [2] 李春敏.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J]. 人文杂志, 2011(1): 6268.
- [3] Massey D. For space[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5: 5557.
- [4] 田晓伟. 论教育研究中的空间转向[J]. 教育研究, 2014, 35(5): 1418.
- [5] 陈时见, 谭丹. 论比较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J]. 比较教育研究, 2020, 42(6): 1925.
- [6] Henry G.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M].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3: 4647.
- [7] 周向伟, 张天雪. 区域高等教育布局调整: 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J]. 江苏高教, 2022(5): 3438.
- [8] 陈先哲.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空间转型[J]. 高等教育研究, 2021, 42(8): 2027.
- [9]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译. 孟锴, 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XV-XViii.
- [10] 梁建章. 网络社会的崛起[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 570.
- [11] Pierson C, Tormey S. Politics at the edge[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1428.
- [12] Bloom D. Raising the press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ed for higher education reform[C]// Jones G, Mccarney P, Skolnik M. Creating knowledge, strengthening nations: the changing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2441.
- [13] De Wit H, Altbach P G.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global trend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its future[J]. Policy Reviews in Higher Education, 2021, 5(1): 2846.
- [14] Marginson S. What is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22, 48(4): 492517.
- [15] Chernilo D. The Critique of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Theory and History[EB/OL]. [2025-11-15]. https://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view_op=view_citation&hl=en&user=QASCP9kAAAAJ&citation_for_view=QASCP9kAAAAJ:_J9oLLwM63sC.
- [16] Wimmer A, Glick S N.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 nation-state building,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J]. Global Networks, 2002, 2(4): 304334.
- [17] Shahjahan R A, Kezar A J. Beyond the “National Container” addressing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i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13, 42(1): 2029.
- [18] Knight J. Higher Education in Turmoil: The Changing Worl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EB/OL]. [2025-11-20].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860928_Higher_Education_in_Turmoil_The_Changing_World_of_Internationalization_J_Knight.
- [19] Knight J. A Time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EB/OL]. (1999-01-01) [2025-11-20]. https://archive.org/details/ERIC_ED549870.10.13140/RG.2.2.10992.17926.
- [20] Knight J. Higher education in turmoil[M]. Leiden: Brill, 2008: 8496.
- [21] Wallerstein I, Wallerstein I M.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300.
- [22] Kelly G P, Altbach P G. Comparative education: challenge and response[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86, 30(1): 89107.
- [23] Sachsenmaier D. 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J].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06, 42(3): 454470.
- [24] Tight M.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s tribe, territory and/or community: a co-citation analysis[J]. Higher Education,

2008,55(5):593605.

- [25] 黄福涛.“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历史与比较的视角[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9398.
- [26] Kaul I, Grunberg I, Stern M.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8.
- [27] Marginson S. Higher Education and Public and Common Good[EB/OL]. [20250806]. <https://ora.ox.ac.uk/objects/uuid:5d205229917343c88b1d-a87a295f8ef5/files/r1c18dh16q>.
- [28] Witte J.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and the climate crisis[M]//Marginson S, Cantwell B, Platonova D, et al.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23:89.
- [29] Callender C, Locke W, Marginson S. Chang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world[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2020:249263.
- [30] Yang R. The Chinese idea of a university: phoenix reborn[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22:95.
- [31] Symonds J C, Sievers B R, James A. Toward an agenda for pursuit of the common good: an exploration[EB/OL]. (20221005) [20250820]. <https://doi.org/10.1525/gp.2022.38554>. 10.1525/gp.2022.38554.
- [32] 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 2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 [33] 祝刚,孔令帅,杨启光,等. 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理路转向[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2(9):89102.
- [34] Beck U. 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51(1):79105.
- [35] Beck U. The cosmopolitan condition: why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fails[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2007,24(7/8):286290.
- [36] Appadurai A.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2748.
- [37] 赵汀阳. 天下体系:在可能与未来之间[J]. 读书,2025(9):310.
- [38] 赵汀阳. 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39] 蔡邕《独断》(节选)《陈政要七事》《正交论》《女训》[EB/OL]. [20250820]. <http://www.hnsl.org/zyrw/zymz/20170921/2664.html>.
- [40] 赵汀阳. 天下理论的先验逻辑:存在论、伦理学和知识论的三维一体[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51(3):517.
- [41] 赵汀阳. 天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J]. 探索与争鸣,2019(9):100108,198.
- [42] 赵汀阳. 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2):7076.
- [43] 赵汀阳. 深化启蒙: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到方法论的关系主义[J]. 哲学研究,2011(1):9093,129.
- [44] Vera-Baceta M A, Thelwall M, Kousha K. Web of science and scopus language coverage[J]. Scientometrics,2019, 121(3):18031813.
- [45] Van Damme D, Van Der Wende M.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M]//Cantwell B, Coates H, King R.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8:94113.
- [46] Chan, Wendy W 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4,8(1):3255.
- [47] Yang Li Li, Tian L. Rethinking the ‘global’ in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from the lens of the Chinese idea of Tianxia[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2022,48(4):536553.
- [48] Yang Rui. The concept of Tianxia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discourses on the west[M]//Halse C. Asia literate schooling in the Asian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2015:4455.
- [49] 杨力蒗,西蒙·马金森,许心,等. 以“天下”思天下:“天下”思想对全球高等教育的新启发[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43(2):113.
- [50] 西蒙·马金森,张婧妍. 高等教育本体论的转向:空间、权力和技术[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4,45(4):113.
- [51] 段世飞.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国际经验与中国范式[J]. 江苏高教,2025(10):1826.
- [52] 郁建兴,黄飏.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J]. 政治学研究,2023(3):1424,167168.
- [53] Callahan W A. Tianxia, empire, and the world[C]//Callahan W A, Barabantseva E. China orders the world:

normative soft power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1: 105.

[54] 赵汀阳. 以天下重新定义政治概念: 问题、条件和方法[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6): 422, 156.

(责任编辑: 杨慷慨 张海生 校对: 张海生)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 Space of Higher Education by Using the Tianxia Theory

Wu Tianyi¹, Zhu Gang²

(1.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exhibits increasingly complex spatial orders and divers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However, the prevailing paradigm of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has confined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within the endogenous analytical unit of the “nation-state.” This not only overlooks the roles of various global and local force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national boundaries but also reinforces an inter-state mindset centered on national competition. Consequently, it undermines the non-exclusive and non-competitive spiri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hampers the orderly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space. In respons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new the global conscious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in a more open and holistic spatial framework and reshape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Zhao Tingyang’s theory of Tianxia (all-under-heaven) offers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conception of spatial order for reexamining the global space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anxia, the global space of higher education presents a complete spatial order and a model of co-existence and harmony. It establishes an ethical stance based on non-exclusive global common interests and relational rationality, operating through a universally effective order-maintenance system. The theory of Tianxia restores the “world” as the subject of global studies, providing an alternative explanatory framework to overcome the long-standing challenges of scale dislocation, fragmented values, and governance failures in research on th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Utilizing Tianxia theory as a theoretical resource for rethinking the global space of higher education symbo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wisdom into a theoretical language with global relevance, addressing the contemporary need to construct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and contribute Chinese discourse to the world.

Key words: Tianxia theory; higher education space;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harmony in diversity